文史资料选辑

第五十九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回忆新民学会 …… 李维汉（1）
广州起义中的教导团 …… 刘祖靖（38）
回忆十九路军在闽反蒋失败经过 …… 蔡廷锴（59）
十九路军调闽前后——“闽变”前的种种酝酿与措施　十九路军在闽反蒋战败经过——结束语
对十九路军与“福建事变”的补充 …… 蒋光鼐（96）
签订粤桂闽三省联防草约——派代表三到苏区和红军联系——“闽变”前筹组人民革命政府的活动——与蒋政权决裂前夕的几件内幕　人民政府成立后的措施——在强敌压迫下惨痛的收场
闻一多殉难记 …… 王　康（114）
钱塘江建桥回忆 …… 茅以升（150）

回忆新民学会

李维汉

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结束了几千年封建帝王的统治，使久受专制奴役的人民在精神上得到一次解放。但是，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又没有得到最大的革命民主派——农民的支持，这次革命的首要果实——国家政权落入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手中。正如毛主席所说的："辛亥革命只把一个皇帝赶跑，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①]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并没有解决。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豪绅买办阶级所豢养和扶植的各派军阀互相争夺，内战不断，陷全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乡村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日益走向破产和没落的境地。同城乡小资产阶级有联系的广大爱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愤于中国社会的黑暗，继续寻找救国救民的出路。新民学会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诞生的。在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新民学会在湖南地区的革命运动中起着核心领导作用，为湖南地区的建党建团工作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一部分参加留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在留法勤工俭学的革命活动和建党建团的准备工作中，也部分地起着骨干作用。现在，就我的记忆并参考当时的一些文献，将新民学会的情况作一简要的回忆。事隔六十年，记忆的事情可能有误，尚望了解情况的同志予以补正。

一

新民学会从不自我标榜，但由于它的乾乾不息的前进运动，在实际上，成为我国在俄国十月革命以后成立的影响最大的革命社团之一。它的主要发起人是毛泽东和蔡和森。

我于一九一六年春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第二部，一九一七年暑期毕业后，即在附小教书。那时，毛泽东、张昆弟，邹彝鼎等在第一师范第一部读书。蔡和森于一九一三年考入第一师范，在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五年与毛主席同学，此时已转至高等师范学习。已毕业的同学何叔衡和萧子升在楚怡小学教书，陈绍休等在一师附小教书。他们常在一起讨论个人和社会如何进步的问题，深感有建立一个组织之必要。经过多次酝酿，大约在一九一七年冬，决定"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活动"，[2]乃有组织学会之议，取名"新民学会"。我因邹彝鼎、张昆弟的联系，也参加在内（邹彝鼎与我从小学起即同学。辛亥革命第二年，我们三人都在湘军工厂艺徒学校同学，曾并肩反抗省军事厅的压迫，被迫离开艺徒学校。他们都是诚实坦白富于前进精神的人）。

一九一八年四月的一个星期天，在长沙岳麓山刘家台子（又叫周家台子）蔡和森家中召开了成立会。参加会的有：毛泽东（润之）、蔡林彬（和森）、萧旭东（子升）、萧植藩（子暲）、陈绍休（赞周）、罗璈阶（章龙）、邹彝鼎（鼎丞）、张昆弟（芝圃）、邹蕴真（泮芹）、周名弟（晓三）、陈书农（启民）、叶瑞龄（兆桢）、何瞻岵（叔衡）、李维汉（和笙）等十四人。[3]会上讨论通过了会章，选举了干事。会章规定学会的宗旨是"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4]会章还规定会员须遵守如下纪律：一、不虚伪；二、不懒惰；三、不浪费；四、不赌博；五、不狎妓。会议选举萧子升为总干事，毛泽东、陈书农为干事。中午，在蔡和森家吃的午饭，饭后继续讨论了会员向外发展的问题，至下午散会。是日，天气晴和，春意盎然，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学会成立后，总部一直设在长沙，由于萧子升不久即去法国，会务由毛泽东主持。至同年八月，罗学瓒（云熙）、周世钊（惇元）、熊楚雄（瑾玎）、熊光楚（焜甫）、陈昌（章甫）、傅昌钰（海涛）、曾以鲁（星煌）、彭道良（则厚）等[5]相继入会，会员增至二十余人。

从新民学会通过的会章，可以看出学会开始只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求“向上”、“互助”的团体。会员们绝大多数是青年人，都抱着要革新、求进步的热烈愿望。但是对于怎样革新？如何进步？尚在摸索中，并不明确。学会的宗旨由开始的“革新学术，砥砺品行”，到后来修改为“改造中国与世界”，其间有一个发展过程。“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宗旨是毛主席平日所主张，而为一九二〇年七月留法会员在蒙达尼集会和一九二一年一月国内会员在长沙集会所一致通过。这个宗旨的变化是新民学会历史发展的一个转折，是新民学会大多数会员在五四运动以后，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和劳动运动，因而在思想上发生重大变化的一个标志。

新民学会会员的活动主要分为两支，一支在国内，主要在湖南；一支在国外，主要在法国。积极倡导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是学会成立后在国内首先开展的一项重要活动，是学会讨论会员向外发展的一个主要措施。

留法运动始于一九一二年，由蔡元培[6]、李石曾、吴稚晖、汪精卫、张继等人发起，吴玉章同志也是发起人之一。留法学生包括官费、俭学和勤工俭学三部分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去法的不多。战后，发展甚速。法国巴黎和国内的北京、上海都建立了华法教育会，有的省如四川、广东建立了分会，主持留法勤工俭学事宜。新民学会成立后，会员深感向外寻求新思想新文化的必要。一九一八年六月，在长沙第一师范附小召开的一次会员会上，确定进行留法运动，由萧子升和蔡和森负责进行。在此之前，已有湖南学生罗喜闻等在进行留法的准备活动，互通一些消息。新民学会的这次会后不久，蔡和森受学会委托赴北京和蔡元培、李石曾联系赴法的准备工作。毛主席在湖南则进行号召和组织工作。在这个过程中湖南也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成立了华法教育会分会。是年八月，毛主席同我们准备留法的二十几个人来到北京。在北京的会员至此增至十二人，有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萧子暲、陈绍休、熊光楚、张昆弟、曾以鲁、邹彝鼎、李维汉、罗学瓒、罗章龙。同来北京的青年还有李富春、贺果、任理、侯昌国、唐灵运等。[7]我们二十几个人从汉口乘火车北上，到了河南郾师（今郾城），因郾师以北铁路被大水冲断，在郾师城郊停留一天一夜，第二天步行到许昌，再搭车到北京。在郾师耽搁的时间里，毛主席和有些同学三三两两的在附近和老乡们交谈，了解风土人情。到北京后，毛主席开始是住在豆腐池九号杨怀中先生家里，后来搬到地安门内三眼井吉安东夹道七号，和蔡和森、罗学瓒等八人住在一起，“隆然高炕，大被同眠”，[8]过着清苦的生活。杨怀中先生来北大教书前是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和高等师范的伦理学教员，思想开明、进步，为人刚正、真诚。新民学会的成立以及我们思想的“向上”都同他对我们的影响有关。对于留法运动，他也十分赞助，亲自出面联系，帮助筹措费用。毛主席当时经杨怀中先生介绍在北大图书馆作助理员工作。其他会员除罗章龙在北大学习外，则分别在北京、保定、蠡县布里村的留法预备班学习。萧子升、萧子暲、陈绍休、熊光楚、邹彝鼎、罗学瓒在北京班；蔡和森在布里村班；张昆弟、李维汉、曾以鲁与李富春、贺果、任理等同在保定育德中学留法预备班。在保定的同学一面学习法语，一面学习机械学、机械制图。每人学一种工艺（钳工、木工、铸工等）。机械学和制图课的教员是刘仙洲。[9]我在保定留法预备班只学习半年。一九一九年初，邹彝鼎病重，我和张昆弟护送他回湖南，不久，他就病故了。他也是学会发起人之一，曾和毛主席一起起草新民学会章程。他和后来留法，于一九二一年病故的陈绍休都是极好的同学。他们的夭折是一件很不幸的事情。

我和张昆弟送邹返湘后未再回保定，我自己是在为筹措赴法用费和安家奔走。（我们一九一九年赴法的一批全是自备用费。我主要靠第一师范教员朱炎先生[10]帮助一百元。）这时，北京爆发了

五四学生爱国运动。湖南人民，特别是青年学生，情绪异常激昂，纷纷起来响应，声援北京学生斗争。已于四月返湘的毛主席和在长沙的会员积极参加了这场斗争，成为运动的骨干力量。长沙各校学生罢课游行，抵制日货，进行爱国宣传，并在斗争中迅速组织起来，改组旧学生联合会，建立以彭璜[1]（后为学会会员）为会长的新的湖南学生联合会。后来又由学生联合会发起，建立了湖南各界联合会，使学生的爱国运动扩展为包括各阶层的人民爱国运动。这个运动遍及全省。许多学校组织了“救国十人团”、“讲演团”。男校学生在街头，女校学生进入居民住宅进行宣传。有的学生还组织了贩卖国货团，上街卖国货，凡购买者随赠国货物品单一张，告诉市民哪些是日货哪些是国货。在长沙，有一次学生查获培德厚绸布店私运的二十匹日布，非常气愤，便联合各界组织了焚烧日货游行大会，将布匹当众烧毁。

以新民学会会员和非会员积极分子为骨干的湖南学生联合会在湖南的五四运动中是个最活跃的组织，起着先锋带头作用。毛主席当时主编学生联合会会刊《湘江评论》。这个刊物在湖南以至全国都有很大影响。北京的《每周评论》、《晨报》、上海的《时事新报》、《湖南》月刊，四川的《星期日》都曾介绍过它或转载过它的文章。它以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战斗姿态投入了五四运动，宣传了科学和民主的思想，歌颂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提倡新思想新文化，激发人们起来向旧思想旧势力作斗争。它在政治上对湖南地区的五四运动有很大的指导作用。刊物的许多文章都是毛主席和其他新民学会会员如萧子暲、陈书农、蒋竹如等所写，毛主席写的尤多。毛主席写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提出以民众大联合的力量实行社会政治改革，对抗强权者、贵族和资本家的主张，提出由分业“小联合”达到各界“大联合”的步骤和方法，并指出“压迫愈深，反动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的革命与反革命斗争的辩证关系。这是毛主席早期的一篇代表新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重要文章。这个刊物发刊时，我尚在湖南，和张昆弟一道同毛主席见过两次面，了解

当时运动的情况，听取他对勤工俭学的意见。我曾按照第一师范第二部毕业同学录上的地址把《湘江评论》分寄给各同学，并介绍一点我所知道的运动的情况，希望他们在当地发动这个运动。

五四运动浪潮中，新民学会在湖南又吸收了一批会员，其中有：罗宗翰（毗迂）、张国基（颐生）、夏曦（蔓伯）、蒋竹如（集虚）、易克嶲（阅灰）、向警予（俊贤，女）、陶毅（斯咏，女）、彭璜（殷柏）、李振翩（承德）、张怀（伯龄）、唐耀章（文甫）、沈均（均一）、李思安（钦文，女）、周敦祥（肫如，女）、魏璧（韫庵，女）、劳君展（启荣，女）、谢南岭（维新）、徐瑛（女）、刘修秩（继庄）、钟国陶（楚生）、张超（泉山）、姜慧宇（竹林）、刘明俨（望成）、欧阳泽（玉生，玉山）、杨润余（女）、陈纯粹、肖道五、李云杭、黄胜白等。随后，易礼容（润生）、任培道（振予，女）、吴家瑛（德庄，女）、贺延祜（女）、吴毓珍（女）、郭亮（靖筋）、谢觉哉（焕南）、陈子博、蔡畅（咸熙，女）、熊季光（作莹，女）、熊叔彬（作璘，女）、刘清扬（女）、许文煊（女）、周毓明（女）、戴毓本（女）等，[19]大多在国内，个别在法国，多数在学会中期，个别在学会末期，先后入会。* 在长沙的会员于一九一九年十一月，曾在周南女校开过一次会，对会章略有修改，决议学会设“评议”、“执行”二部，执行部下设“学校”、“编辑”、“女子”、“留学”等部，并选举何叔衡、李思安为正副委员长，陶毅、周世钊、毛泽东、周敦祥、魏璧、陈书农、张昆弟、蒋竹如等为评议员。此次会后，正值驱张高潮，多数会员即离长沙。

湖南地区的五四爱国运动兴起后，军阀张敬尧始则严密控制，继则实行暴力镇压。一九一九年八、九月间，湖南学生联合会领导长沙群众举行焚烧日货大会。张敬尧带着马弁前来镇压，胁迫彭璜停止反日爱国运动。彭璜不畏强暴，严词拒绝。张敬尧竟悍然解散了湖南学生联合会。张敬尧的暴行激起湖南人民极大的愤慨，一个规模甚大的驱张运动随之兴起。张敬尧为安徽人，是北洋军阀皖系

---

* 新民学会会员至此已查明者共计66人，以后发现有遗漏或错误者当补充修正。

段祺瑞的走狗。他于一九一八年二月湘桂联军战败后，与直系军阀吴佩孚及接近直系的冯玉祥一起进驻湖南，被段祺瑞政府任命为湖南督军兼省长。张敬尧在湖南的统治十分暴虐，人民对他早就十分痛恨。他对学生爱国运动的镇压，便成为驱张运动的直接导火线。在驱张运动中，学会开了会，决定联合各界一面进行驱张宣传，一面组织各界的驱张代表团分赴北京、上海、衡阳、常德、郴州、广州等地活动，争取全国的同情。许多会员都参加了代表团。毛主席和会员李思安、张怀、陈绍休、罗宗翰等联合湖南在京各界，组织了旅京湖南各界委员会作为驱张机关。参加这个委员会的有湖南绅界、政界、军界、工商界以及湘籍国会议员，联合的人十分广泛。毛主席等在北京办了一个"平民通讯社"，专门报导驱张的活动。彭璜、易礼容、何叔衡、夏曦等从一九一九年下半年起先后分赴上海、武汉、衡阳活动。彭璜等在上海办了《天问》杂志，驻衡阳学生请愿团办了《湘潮》杂志，宣传驱张。周南女校校长朱剑凡，商专校长汤松，楚怡学校校长陈夙芳，湘雅医学专门学校秘书赵鸿钧，《民治日报》主编张效敏以及北京国会议员陈嘉言，湖南绅界熊希龄、范源濂[13]等对于驱张都表示某种程度的支持。最后，由于群众斗争的压力和直皖两系军阀之间的矛盾，张敬尧于一九二〇年六月被赶出湖南，湘军谭延闿和赵恒惕控制了湖南。驱张运动的消息传到法国，湘籍勤工俭学生莫不称赞。及至传来胜利消息，更是雀跃不已。

张敬尧被逐出湖南后，进驻长沙的湖南军阀谭延闿、赵恒惕为了巩固他们的统治，发出一个宣布实行"湖南自治"的通电，虚伪地表示要"施行地方自治"，"以湘政分之湘省全体人民"。[14]一九二〇年四月，毛主席为驱张事从北京到上海时，就和彭璜等讨论过驱张之后如何在湖南造就一个比较好的政治环境，促进湖南向较好的方向发展，并曾拟过一个《湖南建设问题条件商榷》的文件，提出废除军阀统治，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要求。[15]谭、赵通电的发布，带来一个复杂的局面。谭、赵以驱张实力派的身份顺利地取得了湖南全省的统治地位，好像理所当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然地也取得了代表三千万湖南人民的发言权，这是一；一九一三年反袁独立失败以来，湖南人民受尽军阀战争和北洋军阀暴虐统治的痛苦，赶走张敬尧后，惟恐北阀再来，于是，"湘人治湘"的呼声四起，谭、赵举起的"湖南自治"的旗帜，正是利用人民的这种愿望，这是二；谭、赵的"以湘政分之湘省全体人民"的口号，本质是欺骗，但是为了装饰"自治"门面，在民众压力下，也将不得不采取某些极为有限的民主措施，这是三。所有这些都表现出事情的两重性，新的军阀统治形式的矛盾性。面临这种复杂局面，应该采取怎样的态度和方针来对待谭、赵提出的"自治"呢？毛主席不赞成采取笼统的反对态度，也不赞成消极的抵制态度，而主张采取积极态度，参加到"自治"运动中去，利用矛盾，进行斗争，启发民众，揭露统治者，尽可能地争取扩大民主因素。新民学会会员们发起建立一个"湖南改造促进会"，提倡"湖南人民自决"，自下地发动争取真正"民治"的群众运动，同谭延闿、赵恒惕的"官治"相对立。毛主席于一九二〇年九、十月间曾连续在湖南《大公报》上发表文章，评论"湖南自治运动"，说明"自治"必须是人民的"自治"，必须以人民为主体，否则"自治"不过是只具外形，其内容一定是腐败的、虚伪的、空洞的。[18]毛主席和在湘会员还联合湖南各界人士发表了一个要求召集"人民宪法会议"、直接平等普遍地选举人民代表的建议书。十月，各界代表向政府请愿要求召集"人民宪法会议"，解散旧的省议会，并发生扯下省议会旗子的事件。事后，谭延闿、赵恒惕就暴露了他们假自治的面目，诬蔑请愿代表"轻信游词，盲从暴动"。[19]赵恒惕赶走了谭延闿，独揽湖南政权之后，炮制了一个"省宪法草案"，并于一九二二年一月正式公布施行。赵恒惕统治集团迫于民众自治运动和舆论的压力，不得不把某些资产阶级性的民主自由权利写进省宪里。因此，这部"省宪法"后来被毛主席和湖南党组织利用作为进行合法斗争的武器。

毛主席在进行驱张运动的前后，特别是在北京活动期间，广泛接触了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据他后来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说，到一

九二〇年夏天，他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当毛主席于一九二〇年四月到上海时，准备赴法的会员陈绍休、熊光楚、萧子暲、张怀、魏璧、劳君展、周敦祥、刘明俨、欧阳泽等也先后到上海，加上已在上海的彭璜、李思安，共有十二个会员。他们曾在上海的半淞园开过一次会，为赴法同学送别。实际上，这是一次讨论新民学会会务的会议。这次会议决议学会应有潜在切实，不务虚荣，不出风头的作风，并主张会员要多组织学术谈话会，使学会养成好学的风气。吸收会员要谨慎严格，会员要有诚恳互助虚心的态度。[9]

一九二〇年七月，毛主席回到湖南。他与在湘会员在参加和领导湖南地区反帝反封建政治运动的同时，以很大的精力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传播新思想新文化。他们团结教育界、新闻界的知名人士组织"俄罗斯研究会"，发起留俄运动。任弼时、萧劲光就是在这个运动中去苏联学习的。在传播新思想方面，除了上面提到的《湘江评论》以及《天问》、《湘潮》以外，毛主席于一九一九年参加主编过一段时间的《新湖南》周刊，以何叔衡为馆长，谢觉哉、周世钊、邹蕴真为编辑的湖南《通俗报》，龙兼公主编的湖南《大公报》等，都起过不同程度的积极作用。而影响最大，与建团建党工作关系最密切的则莫过于创办"文化书社"这件事。

"文化书社"于一九二〇年九月由毛主席亲手创办，书社的《发起缘起》和《社务报告》都为毛主席亲自撰写。书社经理是易礼容。书社不仅是宣传新思想新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阵地，而且是我们留法会员与国内会员，湖南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与国内其他省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的联络站。它的创办对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传播起了很大作用，在全国也很有影响。参加发起和投资的除新民学会许多会员外，还包括教育等界许多上层人士。书社销售的书有一百六十余种。营业后的半年中，全国与之发生联系的书报社和文化团体就有六十家，书社除在长沙设总社外，还在平江、浏西、武冈、宝庆、衡阳、宁乡、溆

由于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和五四运动的推动。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于一九一九年和一九二〇年形成一个空前的热潮。这两年中，全国各地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达一千六百余人，以湖南、四川、广东三省最多。湖南就去了三百多人。这一方面是由于毛主席、蔡和森的提倡，以及熊希龄、章士钊、杨怀中等的赞助；另一方面也是军阀张敬尧摧残湖南文化教育事业，逼得学生走投无路的结果。日后大家开玩笑说："这是张督军'恩赐'的机会。"赴法的新民学会会员有十八人，占会员总数三分之一左右。在湖南教育界工作了二十多年，当时已经四十三岁的徐特立；年过半百的蔡和森的母亲葛健豪，还有贵州教育界的黄齐生（王若飞的舅父）[39]都参加了赴法行列。同学们同他们见面时都称呼徐先生、蔡伯母、黄先生。

我和张昆弟等于一九一九年九月到上海，和许多湖南学生一起住在静安寺路民厚里，候船赴法。位于霞飞路的上海华法教育会人来人往，大都是到这里来办理手续，请购船票，打听消息的准备赴法的学生。报纸的"要闻"栏里刊载许多有关勤工俭学的报导，称赞赴法青年为"探险远征队"。我们于一九一九年十月三十一日乘法国邮船"宝勒加"号自沪启航。同批赴法的有一百六十二人，内有湖南青年四十二人，张昆弟、李富春、李林[40]、贺果、余增生、任理、张增益等在内。我们坐的号称四等舱，实际是底层无等统舱。在海上航行了近四十天，许多人因船身颠簸、震动，头晕呕吐，食量锐减。尤其臭虫多得吓人，扰得我们夜夜不得安宁。一些人只好把袜子套在手上，把裤角扎紧，用毛巾把脸和脖子包住，只露出鼻子和眼睛，以求睡个安稳觉。随我们一起出国的领队人是勤工俭学发起人之一，上海华法教育会会长以后成为国民党右派的张继。他乘的是官舱。十二月七日，我们到达马赛。华法教育会派人接我们到巴黎，把一些准备勤工的学生安置在巴黎西郊哥伦布的华侨协社里住下。华法教育会、留法俭学会、留法勤工俭学会、和平促进会等几个华侨团体都设在里面。我们住的是一座活动的军用帐篷，据说是大战后美国人留下的。长四丈宽半丈的一块地方，住有三、四十人，

都自愿地结成伙食单位，自己弄饭吃。我和李富春、张昆弟、李林、贺果、任理、张增益等人结成一个单位、凑钱买了一个煤油炉子（也叫汽炉子）。吃的主要是空心粉、马铃薯、面包，有时炒点卷心白菜或买点熟的肉食吃。

我们一边候工，一边学法文，看书报。华侨协社有个图书馆，里面有很多用中文翻译过来的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书刊。华法教育会的李石曾、吴稚晖都标榜笃信无政府主义。华法教育会办的《旅欧周刊》、《华工旬刊》也宣传这些思想。这些书刊对我们有很大影响。我们在一九二〇年二月组织了一个"勤工俭学励进会"（简称"工学励进会"）。参加成立会的有李富春、张昆弟、任理、李林、贺果、张增益、李维汉等，当时在蒙达尼的罗学瓒随后也加入了。我们都是只受过中等教育的青年，有提高科学文化水平的愿望，但因家境贫寒，无力升学，一旦知道可以到法国经过勤工达到升学的目的，便想尽办法奔向这条路上来。我们又是怀有爱国主义思想的比较先进的青年，亲受帝国主义侵略、军阀战争和豪绅买办阶级压迫、剥削之苦，痛恨旧的社会制度。我们又多少参加过五四运动或者受过它的影响，向往科学与民主。但是，由于我们在出国前没有或很少接触到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书刊，不像北京大学和接近北大的先进青年那样。他们在李大钊同志的影响下，在"五四"前夜就已经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因此，救国之道如何？真理在何处？我们仍在蒙昧之中，头脑里基本上还是一张白纸。我们读了那些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书刊，对于书中描绘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美妙远景，对于那种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人人劳动，人人读书，平等自由的境界，觉得非常新鲜、美好，觉得这就应该是我们奋斗的目标。有了这个目标，大家就高兴地以为找到了真理。但是，用什么方法，走什么道路达到这个目标呢？我们没有能进一步探讨，以为走勤工俭学的道路就能达到这个目的。工学励进会就是在这样的思想状况下创立的。成立工学励进会的时候，我们订了几条约章，曾寄回国内在《时事新报》上刊登过。宗

旨的大概内容是："在积极方面，想联络一班人共同做事，如储金，定书报，互相勉励，疾病救助，工学交互，为将来别种建画之予备。在消极方面，可以免除孤独生涯之烦苦，环境诱惑之堕落及懒惰之予防等事。"[2]所谓"在积极方面"的几句话，反映了我们当时的小资产阶级工学主义的幻想。可是，我们究意是有进取精神的青年，在以后生活环境和条件的变化中，没有停止自己的脚步。

一九二〇年初春，华法教育会介绍我们到施乃德钢铁厂作工。这是个大型军火工厂，设有好几个分厂。李富春、贺果、李林和我在法国西北部的勒哈佛尔分厂，张昆弟、任理、欧阳钦、刘明俨在圣伯尼分厂，罗学瓒在法国南部的克勒佐总厂。我在工厂里做铸工（我曾在长沙湘军工厂艺徒学校学过一年半铸工），他们几个当钳工。当时铸工除吊车外都是手工，劳动强度很大。做了不到半年工，我的身体支持不住。大家劝我离厂。我应邀到张昆弟、欧阳钦他们那里，休息了一段时间。

在勒哈佛尔时，我们仍然住在一个军用帐篷中。早晚工余之暇，大家自学法语，有的勉强看点法共《人道报》和共产主义小册子，有时也共同讨论研究勤工俭学的问题。经过短时间的工人生活，我们都感到经过勤工很难达到俭学。对于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和管制方法有了初步认识。五一节，看到武装警察对罢工、示威工人的镇压，感到就是在以民主共和著称的国家，工人并无真正的民主自由。我自己自幼过着贫农家庭的生活，对于无钱无权无势的劳动人民受欺压的痛苦境况，有些感性认识。这时又看到民主共和的资本主义社会也是同样的情形，并亲自尝到这种滋味。我在一篇研究勤工俭学的论文中曾写下这样的认识："现在社会的一切不平等都带着十分或九分的经济压迫的原因"，"布尔塞维克的俄国，凡是封建的遗物，如那些军阀、地主、资本家一概扑灭之，以组织世界经济，这样的改革就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实现"。我曾呼吁"中华民族的男女学生打破知识阶级，牺牲着部分时光，做那些农人工人的解放事业"。[3]可以说，我们在此短短的实践和自学中前进了一步。这

一步有重要意义，但仍然只是一些感性认识，没有深入和展开，没有上升到理性认识，没有悟出工人农民只有“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即以暴力战胜暴力，才能获得解放的道理，因而还没有跳出“工学主义”的幻想。新民学会会员中，毛主席、蔡和森接受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道路最早。他们在五四运动前夕，就在李大钊影响下，开始学习和研究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书刊。和森在出国前的一年半时间里，学习了法文，也阅读了一些社会主义著作。一九二〇年二月，和森等到了法国，住在蒙达尼公学。他没有上课，“日惟手字典一册，报纸两页”[19]，以“蛮看”报章杂志为事。在短时间内收集了大量关于马克思主义和各国革命运动的小册子，择其重要急需者“猛看猛译”。当时我和他相隔很远，仅有通信联系。工学励进会的情况就是由我告诉他，他又写信回国告诉毛主席的。和森是学会领导者之一。他到来后，新民学会在法会员的中心很快就移到了蒙达尼。他和在国内的毛主席有密切的通信联系，使国内国外两部分会员联成一个整体。

一九二〇年六月中旬，前后分批抵达法国以及在法入会的新民学会会员已有十六人，有的在克勒佐、勒哈佛尔、圣伯尼等地工厂做工；有的在蒙达尼、枫丹白露等地学校补习法文。刚刚到法国的萧子暲、陈绍休等从国内带来半淞园会议情况的消息。根据半淞园会议关于“巴黎等会员较多之处可组织学术谈话会，定期召集”[20]的意见，我们商定在蒙达尼举行一次聚会。七月五日，会员从各地来到蒙达尼。从六日至十日，在蒙达尼公学的教室开了五天会。与会者有蔡和森、向警予、陈绍休、萧子暲、张昆弟、罗学瓒、蔡畅、李维汉、熊光楚、熊季光、熊叔彬、欧阳泽以及萧子升（当时在华侨协社任职）等十三个会员。一些外省的工学励进会会员也参加了这个会，共二十余人。

这次会议最主要的成绩是确定了新民学会的方针为“改造中国与世界”。但会上对于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方法的看法出现了分歧。一种意见是蔡和森提出的，主张激烈的革命，组织共产党，实行

无产阶级专政，即仿效俄国十月革命的方法；另一种意见是萧子升提出的，主张温和的革命，即无政府主义的蒲鲁东的方法，实质上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森提出的主张，对于多数与会者，特别是临开会前才到达蒙达尼的人们来得比较骤然，缺乏充分考虑的时间，因此对于两种相对立的主张，在会上没有能展开讨论。会议乃决定将两种意见写信告诉毛主席，希望听取国内会员的意见。和森在给毛主席的信中，详述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组织共产党的主张。他明确地说："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而"社会主义必要之方法"为"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我以为先要组织——共产党。因为它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以中国现在的情形看来，须先组织它，然后工团、合作社，才能发生有力的组织。革命运动，劳动运动，才有神经中枢。"[29]和森是我们留法会员中的先驱者。如前所述，我当时虽已经初步认识到改造的最终目标是要消灭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制度，实现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但是，对于改造的道路，还没有跳出小资产阶级工学主义的幻想。集中到一点，就是对于要以革命暴力战胜反革命暴力，以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还缺乏认识。我在会后写给毛主席的信中说："俄国式的革命，我根本上有未敢赞同之处。"现在回忆起来，就是反映了当时对这一根本点缺乏认识。接着又说："但也不反对人家赞成或取法它，说来很长，且待研究，……要多读书，多考察，多与友人研究后，再说。"[30]表现出思想的可变性。

蒙达尼会议开得很活跃，在辩论了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标和道路之后，还谈论了个人感想、会务进行和求学方法。从人生观到宇宙观，从个人理想到人类的未来，差不多都说遍了。最后一天更进行个性的批评与介绍。大家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各自并互相谈了个人的优缺点，思想和个性的极强处和极弱处，以互励互勉，取长补短，对于留在国内的会员，也由相知者向新会员作介绍。毛主席对这次会议的召开表示欣赏。他来信说："诸君感于散处不便，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